

讀王夢鷗教授的「禮記今註今譯」

亞 菁

兼論「大小戴禮記選注」、「禮記選注」

衆所皆知，王夢鷗教授有關「禮記」的著作，目前幾乎成爲中文系所研讀「禮記」必備的參考書。而截至目前有關「禮記」的著作，王教授至少有「鄭注引述別本禮記考釋」、「禮記校證」、「大小戴禮記選注」、「禮記選注」和「禮記今註今譯」等書。而別本考釋、校證皆屬比較專門深入的課程，除非有心從事進一步的研究寫作，一般讀者仍以選注、今註今譯當爲研讀「禮記」的入門讀本。而「大小戴禮記選注」和「禮記選注」僅僅選錄幾篇抑是幾章，自然無法滿足勤學的讀者。欲窺全豹，對「禮記」有周備圓融的認識，勢必從今註今譯著手。

「大小戴禮記選注」和「禮記選注」雖然彼此名稱不同，細心讀者却不難明白原來僅僅章節次序更易而已。雖然冠名「大小戴禮記選注」，其實選自「大戴禮記」的却只有「立事」、「制言」、「子張問入官」和「禮察」等四篇。另外比「禮記選注」多加「大學」、「中庸」而已。就像「禮記今註今譯」也沒有「大學」、「中庸」。將二篇挪出與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合爲四書，另外今註今譯應是一般皆知的事實。雖然「大小戴禮記選注」問世將近半世紀，雖然「大小戴禮記選注」掛名的主編者是中央政治學校國文教材編纂室，有如教科書，可是王教授爲該書寫的「導言」厚達四十頁不下萬言，分禮記源流、大小戴記材料來源、大小戴記選目、大小戴記內容分析、大小戴記讀法、大小戴記參考書等項，詳細闡論剖析，截至目前，似乎仍未見有超軼的同類論文。「禮記選注」的敘略、「禮記今註今譯」的敘，皆極疏略，無法望其項背，有心研讀「大小戴禮記」的讀者不妨細心披閱。唯一讓人遺憾的「大小戴禮記選注」書後却没有附錄參考書目表。「禮記今註今譯」不但和「禮記選注」有長達百種的參考書目，另外更附有一篇依據「禮記正義」禮運篇「承天之祜」下疏及孫希旦考正的「廟祭秩序單」。且又註明無法備載使用參考的字書、類書、前人文集及近代雜誌中外短文。王教授不厭其煩列載如此衆多的參考書籍，讓有興趣進一步研讀「禮記」的讀者不致迷失方向。他認爲上古若干特殊典禮儀式、器物、建築及社會組織等種種名詞，年代復邈，如果僅僅以白話解說，而沒有繪圖、表演，或是長篇的講解，讀者恐怕無法明白。而且有時白話又沒有相當的詞彙能夠表達清楚。而「禮記」本文的涵意，本來就有種種不同的解釋。解釋既然不同，當然無法含糊羈雜如和稀泥。如果要求避免解釋偏頗，僅能將彼此不同的解釋列於「今註」。而「今譯」則僅能抉擇比較可取的解釋，一句一句的翻譯成白話。

對於如何選錄的篇章，王夢鷗教授的去取標準是這樣的：凡是說理透關又有永久價值的，或是能夠闡明儒家思想的，或

是有益個人身心修養的，或是修辭優雅可供欣賞的，或是儒家思想所寄託雖是禮文末節的典章制度等皆予選錄。而將思想陳腐不合時代需要、侈談無稽不合科學精神、典章制度名實俱亡，兩章互見重見等一律淘汰。在四十九篇「禮記」原文被整篇選錄的亦僅僅有「經解」、「學記」、「哀公問」、「坊記」、「仲尼閒居」、「冠義」和「三年問」等篇而已。藉著選錄的去取，他希望一方面能剔去前人已經發現而無法解決的難題，一方面又能保存經久不變的價值。而對於沒有選錄篇章，王教授的補救辦法，仍將「禮記」的四十九篇原文全刊於後，當為選注的下篇。可惜却被功利書商刪除，對有興趣研讀「禮記」進行全書的索解，造成相當層面的傷害。

研讀「禮記」必須從鄭玄的注開始，而唐孔穎達奉敕修撰的「禮記正義」完全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，再加清阮元的「禮記注疏校勘記」，三者是閱讀「禮記」不可偏廢的參考書。鄭注簡奧，有時竟然以三字概括數十字的經文，其中像「曲禮」下篇的鄭注竟然少於原文。今本「禮記」原文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字，而鄭玄也僅僅有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字。有人認為若不明鄭玄，就無法明白「禮記」原文。雖然兩千年來，研讀「禮記」的專家學者都肯定鄭注的存在價值，但是王夢鷗教授却也毫不隱諱指出鄭注有不少本身的難題。誰都無法否認「禮記」的篇目次第、章節先後、字句正譌幾乎全靠鄭注的介紹，後學方有絡脈可尋。於是鄭注有兼記異文，多存異字歧辭的體例，造成將他同時並存的板本掩蓋而全部蕩然亡佚無存。有時鄭注為遷就體例而前後竄亂，甚者自相齟齬，其他像語拙而意義不明，無所發明等瑕疵不一而足。而孔穎達的「禮記正義」雖被譽為詳瞻明備，有時將鄭注一言而衍釋為數百言，有時將鄭注以來多家注疏羅列釐定，却難免讓人深感繁瑣冗長。於是兩宋理學家往往撇開鄭注孔疏那些不合時宜的禮文末節說明，而逕就「禮記」原文的義理作直解或別解，往往流於借題發揮，捨本逐末弊端。

王夢鷗的「禮記今註今譯」可以說是以現代的觀點和語法給予古籍註釋、翻譯。他認為今註今譯原是幫助初學者的了解，秉持「道而弗牽，強而弗抑，開而弗達。」（「學記」）的原則，在不可多不可少的註釋，却要求能夠啓迪讀者。他並不反對「熟知冗長的孔疏，然後可略通簡奧的鄭注」，他亦承認「不讀孔疏則鄭注難明。鄭注不明則原文不易知」的傳統研讀「禮記」路線。他折衷鄭注孔疏的繁簡，在既不悖今又不違古的原則，依照「禮記」原來編次為先後，在各篇題下略作扼要的說明評介，讓讀者有概括性的認識，然後在各章各節後面今註今譯。這些今註今譯的工作，是網羅漢唐宋元明清歷代以迄今人的意見，他又摒棄依傍漢宋的門戶而唯善是從。有時又因為註解引用書目過繁，無法在註語裏夾夾書法，不得不在書後臚列參考書目。

王夢鷗教授的「禮記今註今譯」既然擔當初學者的津梁，務必要求今註今譯信而有微，對於語涉歧疑部份，他絕不妥為附會牽合，強作解人。他堅持的四項要求是：（一）以記注記、求其滙通。（二）無記文可引，而其文義與其他經書有相關涉者，則引以為注。（三）求諸經書而無可引者，則取時代相近之儒說。（四）若時代相近之儒說亦無以取證，則雜引後儒之解釋，擇善而從。若兩說俱善則並存，俱不善則存疑。今日讀者詳細檢視「禮記今註今譯」不難發現下筆矜慎的態度，謙遜的胸懷。試舉數例，自然可窺一斑。他對舊注含糊地方，或是詮釋與上下文無法銜接，顯是牽強，有時雖然後儒群賢舌焦唇敝的辯說，仍無法深中肯綮，他絕不標新立異而妄下斷語，他僅僅註明「故仍從前說」、「姑存其說」、「宜仍從舊說」。如「王制

「篇的「凡居民材」一句，今註引鄭玄的「材藝」、盧植的「材性」兩種舊注後，再引清儒郭嵩燾說此段是申述上文「居民山川沮澤」，說「材」是營建民居的材料，然後再以「盧說爲是」爲評斷。如此矜慎的詮釋，不但對初學者有裨益，即使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亦有相當的啓發性。

「禮記」本是漢儒掇拾古記殘叢，再屬雜當時儀禮書最成篇，猥雜不類一家之言勢所難免。「禮記」雖然僅是記載古代流傳的禮節儀文，却都有其理論依據。「禮記」不僅僅是記錄禮文末節，更是討論那些禮文末節在日常生活的行爲及其構成的理由。歷來有人輕視「禮記」僅是一部「取累世的殘文，合百家而雜篇，不可擬之於經。」認爲「禮記」僅是採摭衆說來詮釋「儀禮」的鉅釘爛簡。其實類似的見解往往失諸武斷欠缺根據。徵諸史實，西漢講「儀禮」，東漢除「儀禮」外兼講「周禮」。講授「禮記」已在魏蜀吳鼎立的三國以後。「儀禮」、「周禮」固然記載上古的禮俗儀式和一套相當完整的建國理想制度。那禮俗儀式固然與先民的生活習慣息息相關，那套理想制度亦常爲聖哲時賢朝夕盼企實踐的藍圖。但是時世轉移，理論本身的變革，於是與日常現實生活日漸脫節，在唐代就有不少知識份子直率坦承「儀禮」、「周禮」的難讀。而爲實踐淑世拯人的熾熱抱負，他們認爲具體辦法蘊藏於「禮記」。於是降及北宋，「禮記」不僅沒因時世的更迭而沒落，甚者反而後來居上，凌邁「儀禮」、「周禮」而成爲禮經的唯一要籍。平心而論，「儀禮」僅陳其數，而「禮記」却詳其義。數往往有盡，而義却無窮。如果沒有「禮記」的闡明引申其義，那麼「儀禮」恐怕將淪落爲古代喪祭社交的一紙禮單。清儒江聲（良庭）臨終前曾囑附其子轉告友人孫星衍（淵如）曰：「疑「儀禮」「周官」（即周禮）之委曲繁重，不可行於今。」孫氏毫不思索回答：「禮意之會通在「禮記」。」

我們研讀「禮記」當然不僅要知禮之數，更要深明禮之義。但是今存的「禮記」有不少後儒引據經典加以疏解，而疏解語句又往往與原文混淆。有不少說義、訓詁屬雜讓人無法辨識。又有不少敘事往往未盡，忽又亂以他語，而他語猶未終，却又以他事代替等讓讀者陷於無法把握的陷阱。清儒陳澧（蘭甫）曾說：「『禮記』當從劉向「別錄」之法，分類而讀。」可謂真知灼見一針見血。可是細按「別錄」的分類，四十九篇的「禮記」編次，却又雜亂無章。而鄭注時時爲保全原本「禮記」的真面目，除在注語裏說明某章某節屬於錯簡外，對於「別錄」的編次，幾乎沒有更動。面對篇次無序，討論課題及前後章節紊亂不堪的「禮記」，建議初學者，不妨以王夢鷗的「禮記今註今譯」爲教材，逐字逐句的研讀，然後以先秦群經諸子及漢人的「春秋繁露」、「論衡」、「鹽鐵論」、「白虎通」、「韓詩外傳」等彼此臚列排比參證，相信在琴絲如麻的迷宮，必定能有所突破，覓見曙光。

